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视域下 高校外语专业教材历史溯源和创新探析^{*}

□文 | 张文超

[摘要] 文章在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校外语专业教材使命与功能的历史性转变基础上提出,新时代新形势下,高校外语专业教材应站在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高度进行认识再深化和创新探索,正确处理好文与道的关系、论与史的关系、古与今的关系、中与外的关系、大与小的关系,为培养讲好中国故事、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有力支撑。

[关键词] 国际传播能力 外语专业教材 高等外语教育

语言是人类文明传承的载体,是相互沟通理解的钥匙,是文明交流互鉴的纽带,承载了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精神品格,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当前,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迫切需要发挥外语学科在融通中外文化、增进文明交流中的独特作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外语专业教材作为教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教学思想的载体,理应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引领外语学科体系、课程体系、教学体系改革,为培养一批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有力支撑。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高校外语专业教材使命与功能的历史性转变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外语教育的发展见证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演变过程,反映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深刻变化。与此相适应,外语专业教材适应不同历史时期外语人才培养需要,使命与功能不断深化与拓展。

1. 革命战争时期:适应培养军事翻译人才和外交翻译人才需要

1941年,为学习苏联的军事科学技术和作战经验,中央军委决定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组建俄文队,专门培养既懂军事又懂俄文、政治思想

素质好的翻译人才。这段时期,教学材料一方面侧重军事方面,中译俄的练习材料多是从《解放日报》和一些政治军事书籍中选择。另一方面,考虑到对外宣传需要,自编了反映当时延安现实生活和国内外抗战形势、国统区的群众斗争、边区反封锁以及生产劳动为内容的俄语会话教材。随着外交形势的发展,1944年,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在俄文学校增设英文专业,把军委俄文学校改名为延安外国语学校,不仅培养外文翻译人才,还注重培养外交人才,为新中国外交事业做准备。讲义取材来源有英文版的《论联合政府》等毛泽东同志著作英译本,以及教师自编的介绍解放区的《十大纲领》《解放区三三制政权》等英文小册子材料。经过学习,多数学员在中共外事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适应培养外事翻译干部和外语师资需要

新中国成立之初,随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国家急需大批俄语翻译干部。以俄语为主体的外语学科主要是“培养学生熟练运用和翻译外国语文能力,使成为翻译干部、外语师资及研究外国文学的人才”。^[1]这段时期,外语专业教材主要以引进苏联教材为主。20世纪60年代,随着我国与西方一些国家以及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外语专业的种类和规模进一步发展。1961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会同教育部、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会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高等学校外语类专业‘理解当代中国’多语种系列教材编写与研究”(21@ZH043)阶段性成果

后,成立了包括外国语言文学在内的14个学科教材编选工作组。基于外事翻译人才培养需要和学生外语学习起点低的现状,无论是外国语学院或综合大学、高等师范院校的外语系,外语专业教学任务主要是“扎实抓好语音、基本词汇、基础语法等基本功的训练,培养学术听、说、读、写、译‘五会’的能力”。^[2]其间,编写出版了英语、俄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等新中国第一批自编通用教材。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急需大批外交外事人才,外语教育发展进入新阶段。

3. 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适应培养具有扎实语言基础和广泛文化知识的高级外语专门人才需要

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和基本国策为外语教育开辟了广阔的发展机遇和空间,同时也提出了更高要求。1978年,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提出外语人才新的培养目标:“不但要充分掌握念、听、讲、写的能力,而且要具备所学语种的语言、文学修养和有关国家的社会、历史知识”。^[3]1994年,原国家教委启动实施“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到世纪之交,外语专业教材得到快速发展,呈现多元化体系化发展态势。以英语专业为例,除编写出版了《综合教程》《现代大学英语》《高级英语》等一大批优质基础课程教材,还出版了语言学、词汇学、语法、写作、文学史、文学选读、文学批评等语言专业知识教材。此外,还开发了法律英语教程、会计英语、现代科技英语阅读教程等专门用途英语教材。

4. 21世纪以来至今:适应培养宽口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需要

21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价值凸显,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对学科综合化、人才复合化、培养融合化的要求更高。1998年,高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关于外语专业面向21世纪本科教育改革若干意见》,提出“单一外语专业和基础技能型的人才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外语专业必须从单科的‘经院式’人才培养模式转向宽口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模式”。^[4]为了达到这一培养目标,高等教育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推出了《大学思辨英语》《新时代核心英语教程》等外语专业系列教材。这些教材不仅注重语言基本功、专业知识和相关学科知识的关系,

选材广泛,包括政治、经济、地理、科技等学科知识,还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思辨能力和创新能力,体现了学科的融合性、知识的时代性和人文理念的融入性。

二、新时代中国高等外语教育 应主动适应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需要

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国家间文化软实力较量和话语权竞争日益激烈。在这一形势下,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让全世界都能听到并听清中国声音,是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5]外语学科在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发挥着先导性和基础性的重要作用。

一方面,语言具有指向性、传播性、描述性、逻辑性、民族性等功能和特征,是构建话语的关键性因素。^[6]正如著名外语教育专家许国璋所指出,“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当它作用于人与人的关系的时候,它是表达相互反应的中介;当它作用于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时候,它是认知事物的工具;当它作用于文化的时候,它是文化信息的载体和容器。”^[7]开展国际传播要以语言为基础,以语言为媒介,使用对象国语言进行传播有助于拉近接受双方的距离,增强中国故事的亲和力和说服力。

另一方面,外语人才的知识能力结构与国际传播需求高度契合。为破解“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国际传播现实困境,提高国际传播效能,不仅要掌握对象国语言,还要掌握受众所在国家、区域的文化特点、接受习惯,以实现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明确要求所培养的人才应掌握外国语言知识、外国文学知识、区域与国别知识,具备外语运用能力、文学赏析能力、跨文化交流能力、思辨能力,这些知识和能力恰恰是国际传播人才所应具备的,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关键。

正是基于语言本身的功能和高校外语学科的建设基础,中国高等外语教育在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具有先天优势,理应回应时代召唤,承担时代使命。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北京外国语大学老教授的回信中强调“深化中外交流,增进各国人民友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大批外语人才,外语院校大有可为”,“努力培养更多有家国情怀、有全球视野、有专业本领的复合型人才,在推动中国更好走向世界、世界更好了解中国上作出新的贡献”。^[8] 这为新时代高等外语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新时代新形势下,中国高等外语教育应以培养学生对外话语能力为新目标、新任务,培养能够用外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时代新人。与此相适应,高校外语专业教材应站在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高度进行认识再深化和创新探索,从而适应时代需求、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发展。

三、高校外语专业教材 创新应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适应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需要的外语专业教材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

1. 文与道的关系

从语言哲学的角度考量,文与道的关系,是语言内容的关系。古今中外不少学者对这一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欧阳修说:“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9] 顾炎武说:“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10] 杜威在论述课程教材与现实生活经验的关系时也指出,“一个课程计划必须考虑能适应现在社会生活的需要;选材时必须以改进我们的共同生活为目的,使将来比过去更美好。”^[11] 欧盟国家倡导的内容与语言融合式教学法(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简称 CLIL),主张在学科内容的学习过程中习得语言,将诸如社会学科内容方面的主题呈现为二语或者外语学习的语境。这为外语专业教材实现技能与知识、价值融合提供了借鉴。打造中国特色的外语专业教材体系,既不能脱离中国立场和对外交流需要,搞所谓的纯外语技能教学;

也不能脱离外语教学的规律,单讲政治话语、学术话语,把外语课当成思政课、其他学科专业课来上。

2. 论与史的关系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离不开摆事实、讲道理,既要明晰西方误解的渊源,又要把中国经验学理化,全方位、多角度向国际社会阐述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1965年,高等教育部在北京召开高等外语院系教学工作会,专家们认为,“为了适应今后实际工作的需要,增强学生的识别、批判能力,应有计划、有领导地组织高年级学生直接读一些反面材料。”^[12] 外语专业教材在选材和练习设计方面,应处理好观点与材料的关系,使学生了解古今中外的各种主要学派和观点,具备批判性思维,有理有据地开展对话。如《跨文化国际传播英语教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单元列举了西方智库污蔑中国“一带一路”的真实案例,通过对知识点“贴标签与污名化”的讲解,帮助学生拆解西方舆论攻心套路,剖析偏见及误解背后的历史、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思辨能力和话语说服力。

3. 古与今的关系

讲好中国故事要把握好“讲什么”的问题。目前,从全国高校外语类专业课程体系来看,一般都在高年级开设了“中国文化概况”相关课程。从教材结构和选篇来看,主要聚焦哲学、文学、艺术、传统节日、饮食文化、服饰、建筑、旅游等方面,不仅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还把其具有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展示出来,对于提升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当代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外交等方面知识在外语专业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中所占比重较少,不利于学生向国际社会讲好当代中国的故事。鉴于此,外语专业教材在选材方面,除了要包含反映中国人价值观念和民族精神的优秀传统文化,还应“全面阐述我国的发展观、文明观、安全观、人权观、生态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13] 使学生既了解“历史中的中国”“舌尖上的中国”“艺术中的中国”,也了解“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进而坚定“四个自信”,有底气、有条理、有依据地讲好中国故事。

4. 中与外的关系

做好国际传播要“知己知彼”。梁启超论及中西话语关系时指出,“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本无用,皆不足以治天下。”^[14]“知己”是指要坚定文化自信。面临闭关锁国之弊端,张之洞呼吁睁眼看世界,发出“知中不知外,谓之聋瞽”^[15]之感叹。如今,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中华民族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反观外语专业教材内容体系,重视目的语文化,忽视中国文化,导致知外不知中者不在少数。早在1964年,陈毅同志谈到外语院校的教学方针问题时,就批评“有些教员教起外国资产阶级文学作品来是那样的津津有味,劲头十足。讲起政治性文件来,却是没精打采,敷衍了事。”^[16]这对当下外语教材建设仍具有警示意义。“知彼”指的是在乐于接受和易于理解上下功夫,让更多国外受众听得懂、听得进、听得明白,不断提升对外传播效果。1952年,外交部组织外国驻华使节看电影,周恩来同志点了《梁山伯与祝英台》,专门提醒翻译不要直译,译成“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果然收效很好。新时代外语专业教材应引导学生加强对中国本土经验、本土实践和本土素材的理解、表达和构建,在此基础上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和国际社会易于接受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实现中国立场与国际表达的统一。

5. 大与小的关系

外语专业教材在内容呈现上要以微观视角为切

口,用真实的数据、现实的事例,鲜活的画面反映人民生活日常,通过见微知著的方式让学生切实感受到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文化的魅力、中国社会的进步。要处理好大主题与小切口之间的关系,以小切口支撑起来的大主题,更具鲜明性、更富感染力。如《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教程》在讲授脱贫攻坚主题时,引导学生在课前检索相关资料,了解过去20年来贫困地区发生的变化,并选取个体家庭的脱贫故事在课堂上讲述。这样的教学设计将“共同富裕”这一政治话语转化为生活话语,将宏大叙事转化为微观叙事,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叙事能力,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四、结语

从高校外语专业教材的发展历程看,每个历史时期的优秀外语教材,都是应时代之需,领时代之先。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战略部署,强调要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高校外语专业教材建设应坚持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在教材编写理念、选材选文、教学设计等方面,扎根中国大地,体现全球视野,教育和引导学生以融通中外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材研究中心)

参考文献:

- [1] [16] 四川外国语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 中国外语教育要事录(1949-1989)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3: 4, 117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高等教育重要文献选编(上) [M]. 上海市高等教育局研究室内部讨论稿, 1979: 388
- [3] 周扬. 重视外语教育——在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 [J]. 人民教育, 1978(10)
- [4] 李传松, 许宝发. 中国近现代外语教育史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468
- [5]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46
- [6] 胡健. 语言、话语与中国的对外传播 [J]. 社会科学文摘, 2021(7)
- [7] 许国璋. 语言的定义、功能、起源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86(2)
- [8] 习近平书信选集(第一卷)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361
- [9] 张春林编. 欧阳修全集 [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9: 263
- [10] 顾炎武. 日知录(卷十九) [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5: 1
- [11] 杜威. 民主主义与教育 [M]. 王承绪, 译.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 209
- [12] 《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编. 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 [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4: 800
- [1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00: 317
- [14] 张品兴主编. 梁启超全集(第一册) [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 86
- [15] 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80